

## 壹、前言

2010年的夏季，在蒸騰的暑氣之中，台灣發生了幾件環境保護事件，引起廣泛的關注。最先登場的是「大埔事件」，爲了擴大竹南科學園區，大埔里附近許多農地被劃入徵收範圍，苗栗縣政府完成土地收購程序，但是有部分農民不願意賣地。6月9日凌晨4點，200、300名警力將大埔里團團圍住，怪手直駛至未繳交權狀人家的稻田，搗毀即將收成的稻穀，農民於是組成自救會，北上抗議。接著雲林縣麥寮鄉台塑六輕一廠於7月7日發生大火，二廠於同月25日發生大火，兩把大火不但凸顯公安問題，也再度激怒了飽受環境污染的鄉民。相形之下，7月13日環保署舉行的第二次國光石化白海豚專家會議簡直如同一場搞笑劇，整場會議不論國光石化、專家委員、環保團體都在爭辯究竟白海豚會不會轉彎？如何確定可以訓練白海豚會轉彎？（朱淑娟，2010）。到了2011年，台塑六輕的公安問題愈演愈烈，模範企業短視近利的作法逐漸暴露出來。

上述事件在「拼經濟」的台灣並非偶發事件，只是短時間內接二連三發生，更讓人意識到，在追求高成長的同時，台灣已經成爲一個高風險的社會。我們引以爲傲的快速現代化與經濟奇蹟並非沒有代價，如何因應風險社會帶來的問題，不只是台灣，也是許多已開發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體系及政策無法迴避的問題。

「風險社會」的概念與討論興起於1980年代中期，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與德國社會學家Beck對於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啓動了這波延續至今的探討。特別是Beck於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一書中，提及現代社會由於高度科技工業化，導致人類的現代化進程邁向另一種風險危機，過去人類對付疾病、災害的策略已不管用，新的風險危機無法預見，也難以精確評估，必須重新認知風險、面對風險並解決風險。由於正值俄國車諾比核能外洩事件爆發之時，引發各界熱烈討論，爲風險社會概念

之源起（顧忠華，2004）。

Beck則將風險社會界定為「必須有系統地處理現代化所帶來的災難及不安全的社會」（Beck, 1992: 21）。當然，現代化之前的人類社會並非沒有風險，相反地，人類一直飽受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災害之威脅。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為「風險社會」，主要是因為工業化之後人們必須面對許多人為的風險，亦即Giddens所說的「製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s），這些風險除了環境污染問題之外，熒熒大者還有生物科技及其倫理、種族文化衝突、全球資本主宰制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面對風險社會時代的來臨，如何培育能夠因應未來社會不確定發展並謀求改進之道的公民，是整個教育體系必須更積極回應的問題。這對長久以來專業掛帥、重科技輕人文的台灣高等教育體系而言，更是嚴峻的挑戰。由於採取專業分科的運作模式，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在專業及通識課程的設計上深受主科、副科觀念的影響，雖然幾經改革，「以通識為全校核心課程」的規劃還有待落實，而「全人教育」更有流於口號的顧慮。面對現代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如何透過課程改革以整合專業與通識教育、拓廣學生視野及社會關懷能力，以強化其風險意識及應變能力，是不少大學亟思改善之處。台灣近年來興起的博雅書院教育雖然仍屬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少數，或可視為大學對於風險社會在課程與教學上的省思與具體回應。

領先辦理書院教育的大學包括清華、東海、政治、中正等4所大學，其書院分別以「清華學院」（後又分為「厚德書院」與「載物書院」）、「博雅書院」、「政大書院」、「紫荊書院」命名，皆於97學年度招生；另有中華大學的「中華書院」於99學年度招生。各校博雅書院的成立宗旨雖不盡相同，整體而言仍秉持博雅教育的通才理念，以住宿教育、特色課程與生活學習等為核心，以突破專業教育的狹隘視野，透過跨領域學習與自我探索，體察專業知識的限制及科技發展的危機。就如同清華大學「載物書院」網頁所指出的（國立清華大學，2011）：